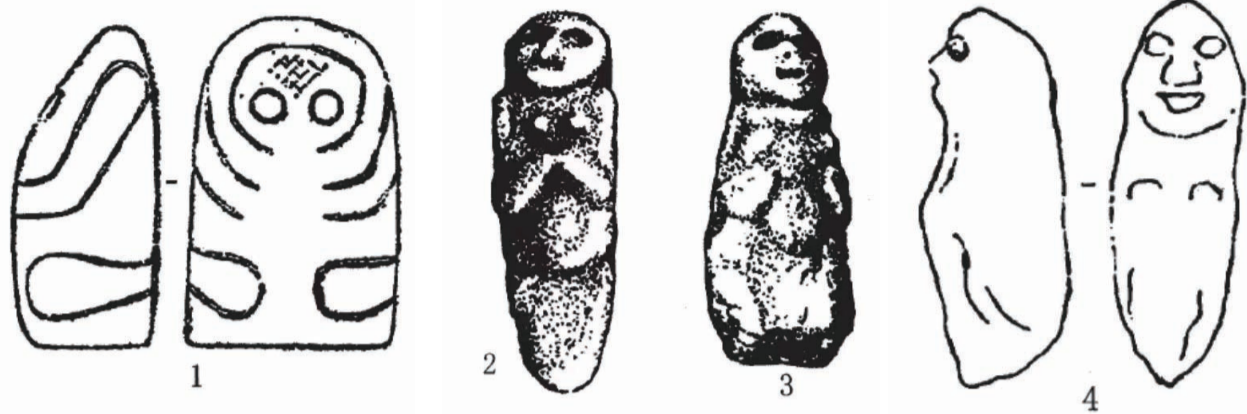


不落窠臼：红山文化之石器(下)

○王升



五、红山文化石器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的三大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是距今5000—6500年间形成的北方文化。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全面繁荣时期，晚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经济上，以农业为主，以牧业、渔业、狩猎业为辅。

红山文化时期，各个遗址出土的石器都比较多。红山文化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并存。石器更注重选料，打磨技术更加纯熟，石器造型更加规整，柄部更容易绑缚，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石锄、石斧、石铲、石耜、石刀都通体打磨，刃部更加锋利。

石耜更具有代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长叶型，刃部呈尖状，另一端从两侧打出柄部；另一种比第一种稍宽，但又短一些，一端打出凹槽，可以系绳固定。双孔石刀通体较薄，造型规整，双孔部位是以对钻的方式打通，打磨得更加精细。细石器选料上，制作上更加精良，石砭、石叶等不仅形体更加规整，刃部更加锋利。

红山文化后期出现了大量的玉器，明显是打磨石器纯熟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

六、小河沿文化石器

进入小河沿文化时期，石器种类更加多样，除了原有的石斧、石刀、磨盘、石杵、石球、石片等，还有石纺轮、石铲等。这一时期以磨制精致的带孔石铲取代了红山文化的石耜。石纺轮大小不等，最大的纺轮重98克，最小的仅有几克重，表现了纺织业比较先进。

石器制作不仅技术更加成熟，更注重艺术的美感。石刃骨柄刀数量较多，仅石棚墓地就出土13件之多。因用于刮削和切割不同，刀的做法不尽相同。石片镶嵌在骨槽内，使用了黑色胶状物，以使石片更牢固地黏接。石叶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更加锋利，有的选择白、黄、紫等颜色对比强烈的各种石料相间匹配，从而使这种骨柄石刃刀成为精美的工艺品。

可以想象，当时首领手持这种精美的骨柄石刃刀是权威的象征。

小河沿文化的先民们过着定居生活，在石器、陶器的艺术上，在文字符号的运用上，都表明这一时期人类已经进入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阶段，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与发展。

七、石雕人像

在20世纪80年代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石雕人像，它的出现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表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得到了提升。

石雕人像最早发现于兴隆洼文化时期，大约为距今6000多年前的文物，兴隆洼文化遗址共发现了4尊石雕人像，如图所示：图中1为坐姿石雕人像，高为8.8厘米，图所展示的是石雕人像的侧面及正面。它是目前所见年代最久远的石雕人像坐像。雕像简单、质朴，寥寥几笔刻画出人物的概貌。石雕像材料为花岗岩，像体表面光滑，底面较平整。头部较大，眼睛圆而大，双臂向前抱拢，两腿向前伸，属于女性阴刻浮雕。

图中2和3是在西山遗址发掘的两尊石雕人像。雕像材质均为花岗岩，表面不光滑，较粗糙，两尊雕像大小不一，但制作手法、造型、风格相同。大的雕像高为67厘米，小的高为40厘米。雕像眼睛下凹，鼻子和嘴较分明。突出的乳房显示为女性雕像。两尊雕像一高一矮，高的耳部明显，矮的不明显；高的双臂交叉在腰腹之间，矮的双臂分开并向上弯曲，矮的还在胸前凸雕出半

圆形顶饰。两尊女性雕像，人体结构比例合理，雕刻技法较成熟，风格古朴典雅，是古老的石雕艺术品。

图中4为发源于白音长汗遗址的石雕人像。该雕像高度为36.6厘米。头部上尖下阔，尤其顶部尖削，前额向前突出眼睛较大略圆并且深陷，鼻子较宽，颧骨稍丰，腹部微微隆起，似有孕之身。该雕像造型古朴，雕刻简单，表现了远古时期对女性生育的崇拜。

在红山诸文化中，还有一些石雕作品，反映了红山文化石器制作水平。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两件石雕人像。那斯台系蒙古语音译，译为松树坡。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在西拉沐沦河以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遗址。

石人雕像第一件高度为35.5厘米，宽度为12.5厘米。由花岗岩制作而成。该雕像出土时受到拖拉机推土铲创击，有的部位呈残损状态。石像头部有一隆起的凸脊从头顶直到鼻子上方。双耳轮廓较大，眉弓隆起，双眼凹陷，大张且凹陷，两臂弯曲向前，两腿弯曲，呈蹲踞状。

石人雕像第二件高度为19.4厘米，宽度为6.2厘米。头部有三轮状饰物，轮顶部平齐。面部呈三角形，眼睛、鼻子、嘴等没有呈现，没有其他特征的刻画。两手合于胸前，束腰，赤脚踏坐状。

那斯台遗址石雕像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的特征，图中左雕像可能是男性，右雕像可能是女性，两尊雕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拉沐沦地区先民的生活状态。

红山文化晚期的石雕作

品，以敖汉四家子草帽山遗址的石雕人头像为代表。该雕像头像尚完好，头像以下并不存在，残高27厘米，宽14厘米。头像有冠，两眼微微闭着，额头较宽，耳朵较大，嘴向外微突。雕像工艺手法多样，在打制和琢制的基础上，阴阳雕刻、圆雕，然后再抛光。雕像形神兼备，是红山文化晚期石雕艺术珍品。

石雕人像是做什么用的呢？学术界观点不尽相同。多数学者认为：在红山文化早期、中期，石雕人像应是对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神灵崇拜的结合，红山先民祈祷上天保佑宗族，多子多孙。

因此，这些石雕人像可能用于祭祀场所。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石雕人像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陶器，后来又是玉器。

2012年在兴隆沟遗址出土了红山文化陶人，更证明了前面所述对祖先、神灵崇拜的推测。后来，在牛河梁遗址又发现了泥塑人像，女神庙中人像有的与真人大小相同，有的是真人的三倍大。

牛河梁女神庙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不仅仅是对家族先人的崇拜，更是对整个部落之神的崇拜。石雕人像、陶塑人像和泥塑人像是先民的生活习俗产物，它的发掘对于深入解读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珍贵的艺术品，对研究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

(十九)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原典

太傅司马宣王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

■释义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出自《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意思是：羹汤的美味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曹魏正始年间，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在曹爽推行的正始改制中，夏侯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给司马懿的回复中，夏侯玄提出改革九品中正制，调整政府行政结构，简化官场繁文缛节三点主张。针对当时政府建置“重累羸弱”“官制不一”等弊端，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为喻，主张上下级官职设置要彼此协调、配合。司马懿一方面称夏侯玄的三点主张“皆大善”，一方面又以“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当待贤能然后了耳”为由相推阻。夏侯玄再次回信司马懿，循循善诱并施加压力，讽刺司马懿的“待贤能”为“伊周不正殷姬之典”。夏侯玄的这篇回复基本反映了正始改制的初衷，根本上触动的是世族门阀的利益。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族门阀集团在暗中积蓄力量，最终通过“高平陵之变”，将围绕在曹爽周围的正始名士几乎一网打尽。纵观东汉政权的衰弱和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莫不与世族门阀过于庞大有关，从而导致隋唐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蒙古族民间谚语：散落在草原上的“金句”

○记者 朝晖

遇见·丁

玛瑙臂鞣



玛瑙臂鞣，赤峰博物馆藏，现展于赤峰博物馆南馆。为辽时期文物，长8.6厘米，宽3.6厘米，厚0.4厘米。玛瑙质地，光泽如蜡，呈微透明，表面琢磨光滑，内含赭红色斑点状纹路，呈多层团状。正面略弧，背面内凹，呈桶形瓦状。左右两侧各钻有一个用于系链的椭圆形穿孔。

东汉许慎的《说文》中解释“臂鞣”：“鞣，臂衣也。”从偏旁可得知，臂鞣最早是用皮革制成，在射箭时佩戴，因为古人发现，使用右手射箭，拉开弓之后，左臂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需要皮包裹胳膊起到保护作用，这就是最早的臂鞣。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先进的金属臂鞣出现了。作为手臂专用防护器具，臂鞣在古代甲冑中以筒袖的形式出现，但其功能仍然是以保护手臂为目的，并最终成为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军事装备。

公元916年辽朝建立，臂鞣曾用作古老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常用的一种猎具。契丹族自古就有驯鸟捕猎的习俗，他们

常年生活在北方，过着游牧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契丹人学会骑马射箭与放鹰纵犬，猎人们经常利用驯养的鹰鹞击捕天鹅等飞禽，游猎时鹰鹞栖于主人手臂之上，由于鹰爪有力而尖锐，极易抓伤手臂，因此，狩猎时将其系在臂上用以护臂架鹰。

随着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到中原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文化类型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将臂鞣融入了更多的装饰工艺，其制作材料也日渐丰富起来，有骨、铜、金银、玛瑙、玉石等材质制作而成。同时，功能上在最初的实用防护功能之外，进而融入了衣着装饰之用。

这件玛瑙臂鞣造型洗练简洁，做工细致整洁，自然纹理十分精美，看得出是辽代工匠的一件倾心之作。这既是古代游牧文化珍贵的历史遗存，也是中国玉石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玉石器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保持着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无穷魅力。

(记者 于红璇 通讯员 张博程)

阿鲁科尔沁旗民间口头艺术种类多、内容丰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在草原深处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赞词、谜语、笑话等，滋养着一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其中，不可胜数的蒙古族民间谚语，像散落的珍珠一样，点缀在高山、溪流、马兰花丛中，和牧人的马鞍与勒勒车上。经过当地文化馆的普查和申报，被及时挖掘、整理、保留了下来。

蒙古族民间谚语历史悠久。《蒙古秘史》里有“衣有衣领，人有头领”“尾巴是唯一的鞭子，影子是唯一的的朋友”和“肝脏有胆，拇指有准”等许多谚语名句。这种民间语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一般由上下两句组成，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流传和比较定型的一门语言艺术，也是蒙古族民众智慧和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蒙古族喜爱马。在他们的心目中，骏马是好汉的代称，是力量、胜利的象征。因此在谚语中，蒙古族常以骏马的形象喻人、喻事、喻理。“赛马途上知骏马，摔跤场内识好汉。”“疯狂的马，容易失足；慌张的人，易出乱子。”这是马背民族的经验，属于性格类的谚语。据说，成吉思汗为了感谢一只“救主人”的猎狗，把汗盔上的一缕红缨摘下来，亲手戴在猎狗脖子上，并说：“主之贵贱，不变其报主之心；主之荣辱，不移其护主之诚。”这则谚语，流传到今天，仍然是蒙古族谚语中的金子，翠玉般作响。

草原，有草原的规则。因此，谚语也往往带着弓弩般的力量，起到了直抵人心的作用。例如“把福禄，送给那贤明的善人；把枪箭，送给那胆小的敌人”。可见，马背上的蒙古男儿爱憎分明，行为果敢坚决。仅仅是通过这一则蒙古族谚语，就表明了蒙古人的心理状态：生活中，深沉随意；出征时，所向披靡。同时，草原生活，也教会了人们这样的辨别经验：在你家草堆着火的时候，你才会遇到属于你的、真正的朋友。于是，草原上就出现了数不尽的谚语。在一代代牧人的传诵中，启迪着蒙古人的思维，修正着蒙古人的行为。

阿鲁科尔沁旗招根镇招根嘎查，曾经有一个叫呼日勒的民间艺人。他善于吹奏笛子、演唱蒙古族民歌，而且还是演说蒙古族祝赞词的行家。他演说的祝赞词里，有许多谚语。当时，该嘎查善于引说谚语的旺吉拉、桑杰扎布和色杰等人，是呼日勒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呼日勒之子吉存从小就对蒙古族民间谚语产生了兴趣。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对流行在本地的蒙古族民间谚语进行了收集，最后整理出3000多条。从2006年开始，他又整理编写蒙古族民间谚语，将已知的蒙古族谚语记录在册，为后期该项目的抢救、挖掘争取了时间。2014年5月，由他以乌力吉图的笔名编著的《蒙古族民间谚语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591千字，收入了蒙古族民间谚语16000条，是目前收入蒙古族民间谚语最多的书籍。

“蒙古族民间谚语是蒙古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阿鲁科尔沁部是古代蒙古科尔沁部的一支。清朝初期，从呼伦贝尔迁徙到现在的地方。三百多年来，人们多从事牧业生产，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蒙古族谚语，便是游牧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今年72岁的蒙古族民间谚语传承人吉存说。

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居住区是保留和传承民间谚语的地方，民间谚语在这里得到广泛使用。较早之前，有关蒙古族民间谚语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实际生活中面临着消失的风险。为此，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把“蒙古族民间谚语”列入第二批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该项目入选赤峰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赤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中的一抹亮色。

吉存把从祖辈、父辈口中听闻的谚语著书成集，延续了家族的精神血脉。然而，非遗项目仅靠一个家族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在民间，协会组织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自



传承人吉存正在整理蒙古族民间谚语。

发的举措，为这项非遗内容增添了美丽的注脚。阿鲁科尔沁旗民族传统文化体育保护协会就是这样民间组织，这里聚集着一群热爱民间文艺活动的牧民。他们设立了蒙古口头文学分会，一直在以民间手段开展谚语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近年来，当地主管部门也加大了保护措施，一连串的动作作为该项目营造了良好的传承氛围和社会知晓度。2016年，阿旗政府组织旗文化馆、苏木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教师和热爱民间谚语的人士，对全旗范围内的民间谚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对所发现的民间谚语进行确认，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产生地和作者等情况详细探索。自此，发祥、成长在这里的每句民间谚语都有了文字、录音、录像等多媒体资料。2018年，《阿鲁科尔沁民间谚语》编辑出版。一本书，涵盖了目前掌握的阿鲁科尔沁全部的民间谚语。2019年，当地举行的《阿鲁科尔沁民间谚语》研讨会和全旗民间谚语演说大赛开幕。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民间谚语能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共同分享、确立了该非

项目的社会文化价值。从2020年开始，“送阿鲁科尔沁民间谚语下乡、进社区和进校园”活动，在当地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和学校遍地开花，由阿鲁科尔沁民间谚语传承人开展的传承活动蔚然成风。

“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传承文本形式把民间口头文学记载成了文字形式，受到了牧民群众的好评。而当地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阿旗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发展，乃至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的丰富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深入，蒙古族民间谚语一定会历久弥新，成为世界民间文学路上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图片由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